

在希望的田野上

——淮安农村改革开放四十年回眸

金志庚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富起来、强起来的新中国以无限的生机、无比的魅力、无争的实力傲立于世界之林，如中天之日，放射出灿烂的光华。

我国是农业大国，作为地处苏北平原的淮安，多少年来也一直是农业见长，特别是解放后，苏北灌溉总渠的开通，淮安的农业生产，如虎添翼，渠北从那时起，即告别了只长旱谷、不长水稻的历史，总渠南北，运河两岸，以稻麦两季并兼种杂粮、薯类作物而一度跻身全国商品粮生产基地行列。但尽管辛勤的淮安农民一直循着老祖宗“面朝黄土背朝天”，甚至以“两个黑洞洞，三个急匆匆”的艰苦劳作，在这片土地上不断耕耘，还是因生产力低下，以至粮食产量不高，农民生活水平相对贫穷，用心血和汗水灌溉的土地一直未能摆脱贫困的困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从此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经济社会得以长足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应该是从农村起步，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是立国之本，也是党中央关注的重点领域，中央在1982年至1986年连续5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2004年至2018年连续15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党的十九大又提出建设“美丽乡村”新理念，于是，这片希望的田野上已绽放出绚丽多彩的花朵，结出了丰硕无比的果实。淮安同样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农村面貌日新月异，

农民生活日臻富足，小康目标如期实现，一个美丽、富裕、繁荣、和谐的新农村，正以崭新的面貌崛起于苏北大地。本文拟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淮安农民的衣、食、住、行四个方面，回眸淮安农村和农民的巨大变化。

人们的穿衣着装常常是体现一个地方经济水平的重要方面。过去人们常常以衣衫褴褛形容穷苦者的着装，解放前，农民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日子，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广大农民得到解放，尽管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在穿衣方面仍是“一年新，二年旧，缝缝补补又三年”，家里孩子多了，大的穿新的，二的穿旧的，缝缝补补给小三子。计划经济时期，一切都凭票供应，有钱无布票，也穿不上新衣服。三年自然灾害时，就连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白衬衫的领子和袖子都是换的，一条浴巾，用了几十年。邓颖超还专门将补袜子的“袜撑”带到西花厅，为总理补袜子用。西部一些农村，连穿上补丁衣服都难。我听许嘉璐先生说过一个故事，他们到西部农村扶贫，村里的干部要求群众都穿戴最好的衣服迎接他们，结果发现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脚上每人穿一只新的运动鞋，另一只脚上是破旧的布鞋。因扶贫物资不足，送来的新鞋是要分配的，干部们每人只分到一只新鞋，他的意思是要建议国家加大扶贫力度。这在我们苏北农村相对而言不至如此，但小的时候我们也是穿着补丁衣服长大的，“文革”时人们的穿衣常常都是“黄、蓝、黑”三种颜色，姑娘们穿件花衣服可称得上是奢侈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农民的着装已与城市人差不多了。记得城里人下乡，曾将自己穿旧的衣服，送给乡下亲戚，那可是一份大礼了，然而现在再送，人家不要了。小伙子、大姑娘们的衣着不仅质地好、式样新，也赶时髦时髦时尚了。

“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作为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一直是党和国家关注的重点。改革开放之前，农村一直是集体经济，农业生产尽管有所发展，但由于农业科技跟不上，生产力相对较低，以致粮食产量一直不高。在淮安这样的产粮区，麦子二三百斤一亩，水稻500—800斤一亩，已是不不错的了。就这样，农民也未能完全解决温饱问题。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毛主席及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主动降低了粮食定量，毛主席坚持不吃猪肉，周总理甚至将邓颖超的粮食定量降到了每月13斤。周总理一生好客，老师们经常在西花厅开会，总理总要留他们吃顿便饭，但无论是亲友登门，还是老同志来访，吃饭可以，必须交粮票。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此，寻常老百姓可想而知。我小时候也一度通过吃糠咽菜的日子。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又过渡到分田到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生活也逐步好起来，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改革开放前的农村，各家各户都在过节时才能吃到猪肉，就连自嘲为“青菜豆腐保平安”的豆制品也算是奢侈品了。如今，农民们已踏上小康之路，肉类食品算是家常便饭，且与城里人一样，为了健康少吃肉，当年赖以充饥的野菜成了餐桌上的佳肴。过去，烧锅煮饭都用麦秸稻草，有时还不够用，我小时候就拿竹筒子到堆垛上划些干枯的草，以解柴火不足之难。改革开放之后，柴草成了废弃物，人们用上了煤炭、液化气，现在都用上了煤气，以致每年夏秋收获季节，干部们最大的任务，就是严禁焚烧麦秸稻草，以还一个天蓝水清的生态环境。与吃饭相关的就是水，改革开放前，农民们吃水都是用河水，下雨天河水浑

了，就挑水到水缸里，打上明矾，使水变清。后来一部分家庭改用手压式地下井水，而如今各家各户都用上了自来水，过上了城里人一样的生活。

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当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原始劳作方式，有所改变，淮安农村播种、收割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且粮食产量逐年提升，麦子亩产500多公斤，水稻亩产700多公斤已成常态化。与农业相关的水利设施不断改善，排灌系统逐步到位，农业旱涝保收之梦得以实现，一个富庶、昌盛、美丽、环保的新农村已在淮安大地上得以呈现。

住房一直是人们用来遮风挡雨的建筑。改革开放前的淮安农村大多是土墙草顶，淮安农村的草屋大多是麦秸盖顶，麦秸易于腐烂，一到雨季，外面下大雨，屋内下小雨，苦不堪言。如果是砖墙瓦顶那些算是富裕人家了，亦或是家里有人在城里拿工资，吃商品粮，寻常百姓家很难达到。改革开放以后，富裕起来的农民开始改变住房条件，特别是上世纪末，江苏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农村实行草改瓦的目标，于是农村一幢幢小楼拔地而起，而有的甚至盖起了小别墅，在淮安农村，从此看不到一座草屋，如果是草屋，那也是有意留下，给影视剧组拍摄的。住房的条件改善了，与之匹配的家具也要跟上时代的潮流。记得小时候，家里人谈到什么是共产主义，那就是能吃上“土豆烧牛肉”，家里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改革开放初期，年轻人结婚能有“三转一响”（即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四大件，那可算是富户了。如今家里电冰箱、洗衣机、彩电等家用电器样样俱全，电话机已成过去，人手一部手机，就连老头老太也配有手机，可经常与在外地打工的儿孙辈发个视频、微信聊天，用淮安农村的老人们话说，真是过上神仙的日子了！

党的加速“美丽乡村”建设的政策指导下，今天的农村又推行集中居住点建设，乡镇所在地盖起了商品房，而农村将逐步建设集中居住点，当年让人羡慕的“天下第一村”的华西村，家家户户住进小别墅的日子，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在淮安农村逐步实现。

改革开放后有一句流行语，叫“要得富，先修路”。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交通事业突飞猛进，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些年来，高速公路、高铁动车、民用机场，遍布全国各地，就连传统的江河水运的条件也走进了现代化。地处苏北的农村交通也在不断改观，特别是江苏省委省政府大力扶持苏北经济发展，给予资金补贴，要求“乡乡通汽车，条条水泥路”，这一目标

很快得以实现。过去淮安农村基本是土路，每到下雨天，路面一片泥泞，淮安农村渠南、运西基本上是粘土，故路面“雨天是烂泥，晴天如刀尖”，行走不便，开车更难。记得我进城工作后，一次因急事回乡下老家，借了一辆小轿车回去，不想，到离家不远的路上，因雨后不久，道路泥泞不说，一处竟因被手扶拖拉机轧出一个大坑，小车子一下陷进坑里，怎么也发动不起来。后来还是乡亲们赶来，一边填土，一边手推人抬，车子才发动前行。我老家在复兴，时任复兴镇的书记号召各家各户拾碎砖头，再买些砂石，铺了几条路，至今老百姓还念他的好。这种路并未维持多久，又都破损不堪了。在上级的支持下，淮安区委区政府下决心，大力投资，加速乡村道路建设。今天，淮安区的乡村已不仅仅是乡（镇）通公路，而是村村通公路，公交车可直达各村，而且加宽加固乡村公路，一律水硬化，甚至黑色化、水泥地一直铺到各家各户，就是下雨天，农村人也和城里人一样，无需穿高靴便可出行了。

淮安农村的道路建设，还得益于淮安已成为苏北的交通枢纽。京沪高速、徐宿淮盐高速公路，贯穿淮安东南西北，正在建设中的连淮扬镇高铁、徐宿淮盐高铁，以及宁淮高铁都在淮安交汇，涟水机场近在咫尺，不久的将来，到南京只要一个小时，到上海两个小时，到北京四个小时。农村道路建设与这些交通通道融会贯通，相得益彰，形成了乡村公路与通往大都市的快速通道交通网络，不仅满足了百姓的出行需求，也为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衣、食、住、行直接与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而与之相关的民生工程，也在改革开放的浩荡春风中得以全面实施。医药卫生，卫生改革促成了区、乡（镇）、村医疗网点科学布局，农民看病有医疗保险，并不断提高医保报销额度，真正达到了病有所医。教育方面，教学网点遍布城乡，校园面貌焕然一新，教学质量不断提升，淮安每年高考、中考都在全市名列前茅，而其中佼佼者不乏来自农村的生源。文化方面，文化大院遍及乡村，娱乐设施不断改善，农民的精神生活丰富多彩，留守在村的妇女们也

也和城里人一样跳起了广场舞。

改革开放40年来，淮安农村的面貌日新月异，农民的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特别是精神面貌，空前振奋，人们在感恩党的好政策的同时，也乘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在这片希望的的土地上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实现美丽乡村建设的目标和伟大的中国梦而阔步前进！

周恩来故居修复时的见闻

秦九凤



修复后的周恩来故居

周恩来故居是1977年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时由江苏省委决定修复的，经淮安人民两年多的努力和奋斗，1979年3月5日周恩来诞辰81周年那天正式对外开放。那年，我正在县委宣传部报道组“打工”。如今，回忆那段峥嵘的岁月，有许多令人感慨的故事，有的还足以让人终生难忘。

亲历贵州青年对周恩来深深的爱

我们报道组的工作除了写新闻之外还有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访客。我记得1979年的元旦刚过，宣传部就接待了来自贵州安顺的一位小伙子。他原来是在北京军区服役的军人。他在服役期间，曾利用节假日去毛主席纪念馆工地参加义务劳动，1978年退伍后回到老家。可是当他一听说淮安正在修复周总理故居时，立即舟车辗转来到数千公里之外的淮安，并径直去了骑马巷修复周恩来故居的工地，要求参加义务劳动。施工方认为天寒地冻的，加之工期很紧张就婉然谢绝了他。谁知这位退伍军人士气很倔，坚决不走，一屁股坐在故居大门外，对施工人员的进出都有一定影响。周恩来故居当时已明确归县委宣传部管，所以，到任不久的故居副主任（一开始无主任）王树荣同志就打电话汇报县委宣传部，时任常务副部长尹金鹤同志就派我前去做动员说服工作。

我来到故居大门口，首先感谢他千里迢迢

同志，也只有少数人被允许听。

刘秉衡回忆，他听周总理说：小时一次和生母万氏，小婶母陈氏一起坐小木船去清江浦外婆家去。周恩来当时才四五岁，上小木船时还是船老大把他抱上船的。那天虽然逆流而上，但刮着东南风，那是从淮安去清江浦的水帆船最好的风向。就在船老大用竹篙点岸即将扬帆起航时，突然岸上传来“大鸾！大鸾”的急切叫声。周恩来他们抬头一看，原来是乳母蒋妈妈迈着一双小脚高一脚、低一脚地正往岸边赶。“我也要和你去清江浦。”蒋妈妈边走边说。

万氏妈妈只好请船工把船再靠岸。待蒋妈妈气喘吁吁地走到近前时，万妈妈对她说：“上船吧。”这时，蒋妈妈的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似的回答说：“我晕船，不敢坐船。”万妈妈愣了一下，忙从衣兜里掏出一沓零碎的钱和铜板递给蒋妈妈：“那你叫一辆黄包车去吧。”“谢谢奶奶。”随着蒋妈妈的这一声回话，她迈着小脚又艰难地向岸上爬去。

然而，不知是蒋妈妈没叫到黄包车还是她舍不得花掉万妈妈给她的钱，她竟没坐车，而是在里（运）河堆堤上步行。她虽是小脚，但走得很快，几乎和水逆流、靠风帆前行的小木船速度差不多。

周恩来还对刘秉衡说，船行至运河东岸枚里街一段时，因为要拐个大弯子，蒋妈妈走在岸上的身影有时会被岸边的芦苇、蒿草和树木等遮挡，使坐在船上的周恩来看不到蒋妈妈。他便急得哭了起来，还连声喊：“蒋妈妈呢，我看不见蒋妈妈了。”直到船行到河下，里运河的弯子没了，周恩来才又见到在岸上奔走的蒋妈妈。他也为此破涕而笑。这是一个幼年周恩来

热爱蒋妈妈的感人故事。

40年过去了，刘秉衡讲这个故事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恍若昨天。那也是我第一次听有关周恩来的故事。

听邢熙坤讲“三母并提”的由来

在周恩来研究界和在我们淮安，有许多人都知道周恩来有三个伟大的母亲，即生母万氏，嗣母陈氏和乳母蒋氏。因为乳母的丈夫姓蒋，周恩来叫她蒋妈妈。周恩来故居就是按“三个妈妈”这一思路布置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到周恩来纪念馆工作后，不断听到对“三母并提”的不同声音。这种声音在周家亲属和中央文献研究室都有，而且不同的看法之间还很激烈地对立。原因是，从幼年到童年哺育，关心周恩来成长的就女性长辈而言，也不止这三位母亲，因为值得一提的还有周恩来的五伯母（又是他的嫡亲十三姨母）、八婶母杨氏和他的干妈、龚荫荪的妻子蔡氏。1982年笔者曾写作了《五位母亲献爱心》（五伯母未写）的文章，《扬子晚报》刊用后被国内报刊广泛转载，连新加坡的《南华早报》都转载了。那么这“三母育鸾”“三母并提”最初是怎么来的呢？

那是1979年春季的一天，《周总理与故乡》写作组成员邢熙坤同志在我们报道组专门汇报这本书的组稿情况。当时《周总理与故乡》写作组的五位笔杆子分别是县委宣传部理论组副组长张人权（无正组长），县委报道组成员、江苏省社科联下放干部邢熙坤，淮安师范老教师卢彬，县文化馆工作人员朱国瑾和淮安棉纺厂办公室主任杨大生。当时他们还都没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宣传部领导就指派周恩来故居副主任狄仁康（排王树荣后边）当组长，讨论书稿时又请周恩来故居文

物资料征集组组长、淮安具体委主任刘干荣参加。在讨论周恩来小时成长的那段书稿时，快人快语的刘干荣说，生母万氏给了周总理开朗的性格以及处事干练的影响；嗣母陈氏给了周总理的是好上学上进、忍辱负重的美好品德的影响；乳母蒋氏给了周总理以热爱劳动人民朴素感情的影响。这样三个妈妈从不同的角度给了伟人全方位的影响。周恩来的精神品德也就十分全面了。

刘干荣的提法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于是，“三个妈妈”不仅作为一个章节写进了《周总理与故乡》一书，也就一下传到了社会上，一直到今天。

听朱珠、王士义讲周恩来的故事

在周恩来故居修复的那段日子里，当时的淮安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兼县政协主席朱珠和县政协常务副主席王士义有一天到我们报道组了解情况。因为那时周恩来才逝世两三年，人们都还沉浸在对他的无限思念当中，加之他的故居正在县委主持下修复，因此人们一谈就把话题引到了他的身上。

当时，朱珠说万氏妈妈中彩后把骑马巷从故居大门口到镇淮楼西路（原响铺街）的一段路铺成砖路路的善举；王士义讲了周恩来小时候在东岳庙龚家过生日时他小表姐送他金鱼风筝，然后他们到东门一带城墙上放风筝的故事。笔者根据王士义的讲述，写了一篇小稿《送“金鱼”——周总理少年时候的故事》，后来被刊登在上海市《少年报》1979年3月7日的头版，还配了插图。这篇只有300来字的小稿，却是我们淮安人最早宣传周恩来的稿件。40多年过去了，笔者至今还收着这份报纸的用稿剪报。



1982年游客在周恩来故居前留影



34年后（2016年）再次留影